

美国当代文学

(上)

丹尼尔·霍夫曼 主编



《世界文学》编辑部

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

美国当代文学

(上)



丹尼尔·霍夫曼主编

《世界文学编辑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美国当代文学（上）

（内部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白纸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375印张 336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313·113

定价：2.40元

编辑说明

介绍、研究外国文学，既要注重它的历史，更要注重它的发展和现状。我们组织翻译《美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目的，便是使读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美国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概括的了解。

原书书名为《哈佛大学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导论》(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为简略明晰，我们改用《美国当代文学》做书名。全书分十二章，由十名大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分别撰写。书中的批评论述虽仅是一家之见，但所提出的背景、资料和作家作品的概貌，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作为外国文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高等院校学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正文旁边注有原书页码，每页的起止用横线分开，如 10/11 指原书第10页止第11页始，依次类推；书后附有“中英文人名对照索引”，人名后的页码指原书页码，页码后面有字母“N”者指该页的注释。

由于全书涉及文学各个门类和千余名作者及数以千计的新作品，所以深感作者、特别是作品的译名统一工作困难，对许

多作品译名的准确性也没有把握，因此我们在作品后面附有原文，供读者查证参考。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疏漏和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1983年5月

原 序

王逢振译

本书是一部批评性的概论，论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一时期美国最主要的文学作品。要描述、分析、评价这么庞大而多样化的文学，即使在一本六百页的书里，也犹如把一条羽绒褥子塞进一个鞋盒。批评家或文学史家，面对着一个人的、有特性的作品和作者，有可能把这些作品或作者归为一般的类别和趋势；他甚至可能不惜牺牲其他所有的作品和作者，着重强调那些他写作时看得见的趋势。在这三十五年期间，文学反映了——而且确实常常预见到——这一时期的不稳定和动乱，不稳定和动乱的特点是许多既定体制和它们赖以存在的文化设想的瓦解。然而，对这些破坏或重建能量的抵抗一向很强，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在我们的文学中也是如此。本书作者们的希望是，后面的章节将体现对文学性质的一种理解，如同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论文《美国的现实》(Reality in America)(载《自由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里所说的那样。半个世纪以前，V·L·帕荣顿特别强调美国文学作品中进步和自由的趋势，特里林在关于他的批评文章里提醒我们，“一种文化不是一条河流的流动，甚至不是一种合流；它存在的形式是一种斗争，或至少是一种争论——

它只能是一种辩证的论证。并且在任何文化里，都可能有一些艺术家本身就包含很大一部分辩证关系，他们的意义和力量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矛盾之中。”

这样一种辩证关系，首先在关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态度的评述中作了探讨，然后又在对伴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几十年写作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中进行探索。当然，任何文学的分期实际上都不会局限于文学史家所划分的阶段。在1945年，也就是我们开始的时间，我们发现处于事业中期的重要的中年小说作家，诸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威廉·福克纳和理查德·赖特等控制着文坛，而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玛丽安·穆尔和W·H·奥登等则控制着诗坛。虽然这些人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已经完成，但是他们仍然在继续创作并影响他们的后继者。关于这些老一代的作家，不论是保守的还是现代派的，我们都不想作全面的论述，而是想努力按照他们自己出现的时期，按照他们对仿效或反对他们权威存在的年轻一代作家出现的时期，让读者了解他们。

如果对我们这一时期的开始有必要作回顾性的论述，那么很难认为这一时期的截止便是我们对这一时期作品研究的停止。甚至我们到出版界了解，这里讨论的许多作者也正在出版新的作品，而无须等待我们的评论。虽然我们试图论及直到1978年所有的重要作品，但我们仍不能提供一个终结的日期。在这种文学里，辩证关系的一个明显的方面，是许多作家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经历巨大的风格和方法变化的倾向。对于象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或W·S·摩温这类变化迅

速、富于想象的艺术家的，要预言他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是轻率的事情；同样，任何关于已故的罗伯特·洛厄尔或约翰·贝里曼的这种预言，也不曾精确地预示他们的否定或创新。我们努力讨论大部分已经写出一批有意义著作的作家，并论及一些更有希望的年轻一代的作家。

这部《导论》(Guide)不是一本批评或学术评论的概要，而是一些批评家所写的关于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和作家的有创见的论文集。这卷书的总编辑负责全书的整个规划，但在规划之内，每一章的作者都自由地表达他或她在评述的文学里自己所理解的辩证观念。似乎更可取的是，这种批评——特别当它论及象这几页提到的许多文学的多变、晦涩和创新的作品时——成为埃德温·米尔(在《诗的状况》[The Estate of Poetry, 1962]一书里)解释为“在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一种有益的媒介”的那种批评。米尔提出，这种批评的价值之一是“它对于赞美的宽容……一个好的这种风格的批评家，是一个凭着自然的共鸣来理解一部想象作品的优点并从中得到享受的人。”这样一个批评家的著作，会加强读者对于它所论及的作品的体会，因为它既揭示作品的固有形式，同时又对实现它们的前提作出判断；但是，它不会代替对作品本身的批评分析，重新使阅读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成为一种问题而不是一种经验”。所以这种中间媒介的批评，反对伤害它所论及的文学而成为“一种权力的工具”。

这本书的作者们希望已经向读者阐明了常常是陌生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构思，这些读者读了一些他们感兴趣而又难懂的作品之后向我们这本书寻求指导，或者在读了我们这本书之后被促使转向我们讨论过的作家。虽然我们意识到应起某种可能的

参考作用（并且已经为所有提及的作品提供了初版的时间），但我们并不期望这本导论基本上成为学者的一个资料库。我们编这本书是希望它将扩大当代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有助于鼓励对当代文学作品所体现的题材、形式和价值的重大辩证关系作有见地的讨论。

在组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好几位朋友提出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我都尽可能地加以采纳。不用说，这里的任何缺陷都是我自己的责任，而许多我希望会出现的恰如其分的地方，则是我从拉尔夫·埃利森、艾尔弗雷德·卡静、A·沃尔顿·利茨、理查德·路德威格、西奥多·索洛塔罗夫、罗伯特·E·斯皮勒、海伦·凡德勒和罗伯特·潘·沃伦等人所得到的良好的建议的结果。

丹尼尔·霍夫曼

1979年3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原 序.....	丹尼尔·霍夫曼 王逢振译(3)
1.思想背景.....	艾伦·特拉顿伯格 王逢振译(1)
2.文学批评.....	A·沃尔顿·利茨 董衡巽译(67)
3.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风俗小说家.....	利奥·布劳迪 王永年译(111)
4.南方小说.....	刘易斯·P·辛普森 黄 梅译(210)
5.犹太作家.....	马克·谢克纳 林 凡译(263)
6.实验小说.....	约瑟芬·韩丁 韩邦凯 冯国忠译(329)
7.黑人文学.....	小内森·A·司各特 文美惠 王义国译(399)

8. 妇女文学.....伊丽莎白·詹威
郑启吟译(479)
9. 戏剧.....杰拉尔德·威尔斯
沈培锡 汪义群译(559)
10. 诗歌：现代主义之后.....丹尼尔·霍夫曼
裘小龙译(628)
11. 诗歌：异端流派.....丹尼尔·霍夫曼
裘小龙译(718)
12. 诗歌：派别外离心分子.....丹尼尔·霍夫曼
赵毅衡译(822)
- 附录：中英文人名对照索引.....(839)

1

思想背景

艾伦·特拉顿伯格

王逢振译

1929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里，T·S·艾略特想说明他所谓的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突出的“简明性”和“普遍性”，即他的作品为什么仍然“容易读懂”。这决不是说但丁是一个简单的或肤浅的诗人，而是说他是一个极其卓越的“清晰”的诗人，一个“视觉形象清楚的”诗人，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以致这些事物形象本身就把事物和意义融合到一起。艾略特把但丁这种半透明性的诗归因于他的“比喻的方法”。但比方法本身更重要的却是隐藏在方法背后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历史事实：比喻本身是一种普遍性的（即欧洲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意大利地区性的习俗”的事实。在但丁的诗的透彻性里，人们发现有证据说明，“他不仅用当时整个欧洲每一个有他那样文化的人的思考方式思考，而且他还运用了一种在整个欧洲既普通又能被大家理解的方法。”但丁不象现代作家那样，面临着艾略特在1923年论乔伊斯^①的《尤利西斯》

①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创作中大量使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著有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尤利西斯》等。

(Ulysses)著名论文里所描述的困境，即必须对当代生活中无能和混乱的巨幅全景给以“形式和意义”；但丁面临的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观，一种在复杂而和谐的体系里包罗万象的哲学和神学。

$\frac{1}{2}$ 不论艾略特对但丁在他文化中的地位作何评价，他的形象至今仍然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属于一种文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作家可以领受一种哲学，受到它的指导，并且使它达到完善的表现。这种形象之所以激发人心，是因为它适用于解释现代作家设想自己所处的完全相反的处境。艾略特的但丁在自己的世界里得心应手，驰骋自如，而艾略特和他那些二十世纪初期奠定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同道者则并非如此。艺术家的“无家可归”和异化是现代派的基本前提，是艺术和思想界那种主导运动的前提，这一运动赞助艺术家在美学上和理智上唱反调，赞助他们无休止地创新和实验，甚至常常赞助他们完全陷入艰深和费解，这就把艺术家的异化竟然提高到做一个艺术家的首要条件。但丁“容易”的地方，就是说，正好是在通向他诗歌的入口处，现代作家——按照艾略特的看法——一定要艰深，要恰好晦涩到当代生活的“纷繁复杂”，不允许他采用一种智力图解的程度。

因此，要描述现代文学任何一个时期的“思想背景”，都不同于描述表现古典的、中世纪的或者文艺复兴早期的思想和世界观。现代文学作品——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恰如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的任何时期——很少是用一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例如阿奎那^①

① 阿奎那（1226—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

的结构丰富而复杂的系统，而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也很难读得懂。现代批评家认为，整个文学作品与“思想”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而且也非常模糊。正如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卓越论文《文学思想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 Literary Idea, 1949）里所论证的，美国现代文化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怀疑情绪，按照它们采取抽象思想的形式，思想意识表现了对整个生活的一种威胁，表现了对为了一种健康的存在和富于生命的艺术所必需的和感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威胁。艾略特自己就表现了一种这样的恐惧，他提出，思想若与感情分开，本身就能“破坏”作家的创造能力；而自从1945年以来，在艺术和整个文化里出现的对自发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崇拜，则表现了其他关于这种怀疑的更明显的反理性的看法。美国文化本来就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把理论化当成一种“思想疾病”，再加上对战后最初几年限制思想意识的特别厌恶心情，那么，“思想背景”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就变得更令人怀疑。

当然，对思想的怀疑或反对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本身就是“背景”的一个特点，某些文学作品就是它的近景。对思想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反对，确实是这一时期许多作品的一个特点。 $\frac{2}{3}$ 但是，对于一个由“学院派作家”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社会的代表而出现的时代，那种非书生气作家的姿态似乎特别显得是伪装。事实上，在美国文学史上，以前从未有过这样多的作家，这样多第一流的和重要的作家，与学术研究部门有过正式的联系：这个现象不仅指出了接受严肃文学的新基础，大学生当中的新读者，而且还在更深刻的程度上，指出了对文学的新的承认，即承认文学本身是一种严肃而正统的知识形式——就是

说，既是一种思想形式，也是一种感情形式；一种关于普遍存在的思维的形式。

一个时期的思想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一定是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一部工作和消遣的形式变化的历史，一部个人和公众生活的历史，而就美国这些年的社会来说，则是一部对于种族、性、财富、贫穷等社会态度变化的历史——也是对于美国本身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变化的历史。一种思想背景在活跃的人类历史中有其本身的背景，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对标志战后几十年美国特点的一些比较主要的形式及不断重复的问题加以概述，一定会有所助益。

冷 战

1945年盟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国际事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战争几乎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创伤（就它的二十五万人伤亡与苏联近二千万人的伤亡比较而言），并且使它成为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原子弹武器的不可想象的破坏规模在1945年8月袭击日本城市时两次得到了证实。美国的工厂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农业产量远远超过了国内的需要，美国成了世界上毫无疑问的超级强国，并且很快担负起援助西欧和日本的计划。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这一事态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影响到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只有在六十年代末为缓和作出努力时才多少有些减轻。冷战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感情现象，是政策的状态，也是思想的状态。它以某种世界图景为前提，把世界划分为两个敌对

的阵营：西方阵营或“自由世界”，以美国为首，受到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东方阵营，以苏联为首，由它的“卫星”盟国支持，即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虽然到六十年代中期苏中关系已经恶化到公开敌对的程度）。按照西方对这一图景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美国比其他地方更激烈更固执——东方阵营代表着一个强大的侵略性的极权主义，需要用在东西方世界的边界设置军事基地的方式进行遏制，用间谍的形式进行监视，并且用“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军事上的准备。因为敌人的“颠覆”跟军事侵略一样危险，所以“遏制”政策也包括对“反共”政权的支持，这些政权不论是否符合政治民主的标准，都被当做“自由世界”的伙伴。

冷战表现了对世界事务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和军事介入，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相当新的一种情况，尽管美国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作用一直在不断发展。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事件，包括最偏僻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事件，不仅可以立即收作“新闻”（作为外层空间技术的一个直接结果，在六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直接通讯系统已经应用），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美国人的生活。冷战中的主要事件——其中有些具有真正冲突的危险并且引起对大规模毁灭的普遍不安，包括1948年的柏林封锁，1949年的苏联的原子弹爆炸（这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后来其他好几个国家实验了核武器，引起了对放射性尘埃威胁生命的巨大恐惧），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以及1962年古巴的导弹危机。有两次美国把部队投入了真正的“热”战，但两次都没有正式宣战：一次是1950—1952年

在朝鲜；另一次更富戏剧性，投入的规模更大，即约1964—1973年在越南，差不多五十多万部队和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力量投入了战争。美国在两次战争中的总伤亡远远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数字。

因此，冷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它使得政府机构权力空前集中，特别是那些与战争事务和间谍情报有关的机构，也影响到战争技术、通讯和运输技术的惊人的发展。六十年代，在日益高涨的反对越战的浪潮中，许多冷战的设想以及使这些设想具体化的政府机构，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和抨击。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里，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毫无疑问，冷战的世界观对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分为“我们”、“自由”和民主与“他们”、极权和“邪恶”的世界状况，看起来无法动摇，正如人们推断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和警惕一样。在五十年代，一种高尚的美德受到阴险敌人威胁的感觉，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五十年代是一个追捕、黑名单、忠诚宣誓、指控“颠覆”、审判间谍和教徒以及以“阴谋”罪而监禁共产主义分子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时期。

但是，即使不算以冷战为名的耸人听闻的过度行动，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关于“内部颠覆”的恐惧的宣传，思想上的冷战状态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知识界的生活。在五十年代，即被某些批评家描写为“遵命时代”的时期，对于美国社会的根本性的批评，特别是激进观点的批评，几乎从公众生活里全部消弭。许多在三十年代与激进事业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曾有过联系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要么在这一时期彻底改变他们的立场，以一个悔过的“反共产主义者”出